

与莫斯科决裂

〔苏〕阿·舍甫琴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复 D751.20
又 3

与莫斯科决裂

〔苏〕阿 舍甫琴柯 著
王观声 郭健哉 隋竹梅 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Arkady N. Shevchenko
BREAKING WITH MOSCOW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85

据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图书公司

1985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可铮

封面设计：孙为平

与莫斯科决裂

〔苏〕阿·舍甫琴柯 著

王观声 郭健哉 隋竹梅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4.25 字数：360,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

书号：3003·1718 定价：2.65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叛逃美国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的政治回忆录。

舍甫琴柯1930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的一个医生的家庭。1954年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进修。1956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工作。因颇受葛罗米柯赏识，很快出任苏联驻外使团中的高级职务。他曾任葛罗米柯的顾问。最后于1973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5年，他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内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沦为该局的特务，为美国窃取了大量有关苏联内政外交的机密情报。1978年，舍甫琴柯正式叛逃，在美国定居。

舍甫琴柯在书中详细叙述了他进入外交界直至出逃期间的工作经历与所见所闻。由于他曾参与苏联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并同赫鲁晓夫、葛罗米柯等人有过较多的直接接触，所以本书对于了解苏联外交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也是我们翻译出版此书的目的所在。至于书中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攻击，相信读者会注意识别；书中所引列宁的言论，个别处与列宁的原话有出入；与中国有关的某些史实也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为保持本书原貌起见，这些地方一律按原书译出，不再一一说明。

前言

我撰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不是向美国人灌输敌视苏联人民的感情，也决不是要使谋求和平的努力复杂化。想这样做的疯子，世界上已经不少。我只是要把我在苏维埃制度下的经历告诉读者，说出我所亲身体验的有关苏维埃制度的真相，并把苏联的图谋公诸于世，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图谋给世界带来的危险，我也希望，我能以这样的方式对苏联人民最终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略尽绵薄之力。

要想把苏联从地球上抹掉，或使它离开当代世界权力中心的位置，是办不到的。人类的生存可能有赖于苏美之间建立温和的关系。两国都拥有足以消灭或拯救人类的空前力量。双方在很大程度上都以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来判断对方的意图，而且，毫不奇怪，由此而引起的误会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对抗。因此，对西方来说，尽可能准确而完整地了解克里姆林宫决策者的思想和态度，这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并非甘愿当间谍”。这个标题表达了我对于同美国政府秘密合作的感受。人们普遍认为，当间谍是个不大光彩的行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充当外国间谍更是对祖国极不忠诚的表现。但我从不认为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间谍，也从不认为我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和祖国。我一贯热爱俄国，今后仍将永远如此。在我这一生中，有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曾和美国政府合作，帮助它更好地了解苏维埃政权的目标和所作所为——对于这个政权我了如指掌，并日渐产生了憎恨之心。我所“背叛”的只是这个政权以及支撑它的那个社会制度。

由于本书涉及一些当前的敏感问题，我对若干人物的姓名作了更改，某些消息来源也未加说明。我不想使我所尊敬的任何人——无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受到伤害，如果公布真实姓名，他们可能会遭殃。

这本书是为一般公众而写的。我尽可能对许多事情作简单明了的说明，但鉴于国际关系本身的复杂性，要做到这一点往往并不容易。在这一方面，我必须强调指出，要在一本书中把我的个人经历或苏联的处境和问题的每一个重要方面作详尽的叙述，是绝不可能的。我打算将来再对苏联和联合国进行更多正式的学术研究。

我要对协助我完成本书的人们深表谢忱。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妻子伊莱恩，她无时无刻不给我以巨大的帮助和鼓励。要是没有她，这本书决不可能写成，这话听起来可能像是一种陈词滥调，但却都是真情实况。尽管我曾经在苏联出版过几本书并发表过许多文章，但写一本“美国式”的书还是使我深感棘手。适合于苏联读者口味的文风、笔法，和英语国家所习惯的文风和笔法是迥然不同的。我只是在几次轻率的提笔之后才找到了“开锁”的钥匙。在整个过程中，伊莱恩始终是耐心而兴致勃勃的。

我也应对挚友威廉·盖默表示真诚的谢意。他的坚定支持、睿智和判断力对我至为珍贵。在灰心丧气和遭到挫折的时候，每次都是比尔使伊莱恩和我重整旗鼓。

我十分感谢我的编辑阿什贝尔·格林和其他在写书过程中曾帮助过我的人所作的贡献。

撰写此书时最使我满意的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在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需惴惴于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是否能被人接受。美国给了我避难所并使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却是它所给予的最厚重的礼品。

阿尔卡季·尼·舍甫琴柯

1984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并非甘愿当间谍	(1)
第二部分 一个苏联外交官所受的教育	(61)
第三部分 一出好戏 终于收场	(392)
后 记	(430)

第一部分

并非甘愿当间谍

(一)

我咒骂自己。在纽约皇后区大桥的正当中，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把我夹在其中。我用俄语的粗话发泄心中的怒气，咒骂自己没有预见到交通堵塞问题。我精心安排的计划可能被打乱，这使我感到恼怒。

我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似乎我的意志力可以把汽车从缓缓行进的车队中举起。任何一个纽约人都知道不应在这熙熙攘攘的星期五晚上开车驶出曼哈顿。而我已在纽约居住多年，自认为可算是一个本地人。偏偏就是今晚我不能迟到，以免耽误这次生死攸关的约会。

我冷静地为这次会面做了准备，反复核实了时间和其他细节。但是，可能失败的不安心情，这时却油然而生，如果我约见的那个人没在等我怎么办？如果他认为整个安排是个圈套怎么办？我以后还能再和他联系上吗？

然后我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是否已经有人识破了我的秘密？假如我已被人出卖而陷入圈套又怎么办？在这车水马龙之中，是不是有一辆汽车混在里面正在后面跟踪我？

在苏联长大和受教育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有病态的疑惧心。在那里，为了求得自保，怀疑他人的动机已成为人的第二天性。

我在纽约的日常生活，有时经常不断、有时断断续续地受到

监视，这已成为常规。我希望这一天晚上对我的监视有所放松。但是，由于没有把握，我感到心惊肉跳。我必须搞清楚是否有人跟踪，但又无法搞清楚。车辆密密麻麻，从反光镜中看到的只是一大片车灯，哪辆车也看不清。

如果有人在监视我，至少截至此时为止他还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可以报告。苏联外交官、联合国官员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只不过是象往常一样在度周末，驱车前往坐落在长岛格伦科弗的一座破旧的乡间别墅——那是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其高级官员们提供的。我希望监视者没有掌握今晚跟踪我的充分理由。我正前去和一位在曼哈顿等我的美国官员秘密会面。可是我必须在不受跟踪的情况下见到他。我的司机正在某地度周末，他是个克格勃人员。我的高级私人助手也是克格勃人员，他在第三十五层楼上我的办公室工作，我自1973年春天出任主管政治和安理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办公室。我知道另一些时常在我身边出现的人也是克格勃人员。

我生活在阴影之中已有多年，但这并没有使这种状况更易于忍受。我已学会和克格勃相处，在生活和工作中对于他们的威胁和侵犯泰然处之——几乎每个苏联人都是如此。但今晚我终于在设法永远摆脱他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的意图还得继续保密一段时间。我得确保我的计划不引起苏联人的任何怀疑，还得确保美国人愿意迅速帮助我实现这一计划。汽车上了长岛高速公路之后，车辆逐渐减少。一阵惶恐不安的心情再次向我袭来。我加快了车速。

我发现有辆汽车尾随于后。在任何其他驾车的人看来，那只是一辆普普通通的新型的别克牌轿车。但是，这辆车的型号、式样和颜色都是我在苏联代表团的同事们所最喜欢的。克格勃在纽约的站长就驾驶这样一辆车。这辆车的出现也许不说明任何问题。车中坐的可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经常来往于城市与郊区的人。但也可能是苏联派出的监视车。

我得弄清楚它是否在尾随我。我开始在几条车道上穿行，这引起了其他开车人的咒骂和鸣笛警告。我忽而加速前进，忽而减速缓行，但那辆彪克车仍然跟在后面，和我相隔只有五、六辆车之远。当我把车速加到六十、七十、七十五公里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疾驶，我的脑子也变得浑沌不清了。很快我就到了第三十九号公路的出口处，从那儿可以拐弯去格伦科弗。我轻轻踩了踩煞车，并使汽车猛地穿过右边的车道，拐进出口的斜坡，然后开上一条漆黑的便道。如果那辆彪克汽车跟来，我就知道出事了。它没有跟来。有人跟踪只是我的臆想。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地大大松了一口气。

一辆警车呼啸而来，从反光镜中我看到一盏忽明忽暗的红色车灯。但是追来的不是克格勃，而是刚才看到我开车横冲直撞的纳索县警察。

我道了歉，并决定不利用外交豁免权。出示我的证件可能使我免受罚款，但却要和他长时间争论。苏联人可能路过看到我们。可能有人会注意到时间。有人可能会想，我是7点钟在距格伦科弗只有几英里处被拦截的，为什么却要几个小时之后才到达那里。我不能冒这个险。这时我急于返回曼哈顿。我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位警官喋喋不休的训斥和他交给我的罚款单。

这一切都发生于几个星期之前，地点是我在联合国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做出了和苏维埃制度决裂的最后决定。

我在联合国的许多同事都把我看作一个强硬派，和在秘书处的苏联利益的正统捍卫者，不惜曲解各项规定使之有利于苏联。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在工作中必须听命于莫斯科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布·马立克。而且一般人都知道我是个竭力扩充自己权势的有经验的苏联官员这一点，也有助于形成上述形象。二十多年来，我深受苏维埃制度的价值观念及其所追求的目标的熏陶，并曾和苏联领导人共事，这些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环境使我成为一种自动运转的钟表式的机器，要它停下

来并不容易。

但是，随着我对苏维埃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日益不满，我对同苏联愿望相反的想法和措施不时暗中给予支持。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有机会时我就插手，这使我越来越感到惬意。但我怀疑美国人是否知道这一点。我觉得我已名声在外，他们可能不相信我的诚意。他们可能追究我的动机，而以灰心丧气或不满作解释是难以使他们相信的。我想他们会有兴趣听取我的申述，但另一方面，这时缓和正处于全盛时期。美国会愿意冒使缓和的美景哪怕是稍受影响的风险，而给我以庇护吗？苏联人可能会指责美国破坏苏美关系的气氛。一个人，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他个人毕竟不能同国际关系的大局相比。

美国人也可能会认为我是在搞什么名堂，或者更糟的是，以为我发疯了。他们也许会怀疑我吸毒或因酗酒而脑子失灵了。

虽然我不能肯定美国人将如何看待我的变节，但我毫不怀疑苏联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事情败露了。他们就会把我送回国，我的未来是可怕的，或者可能根本没有未来可言。象棋冠军或艺术家们叛逃是一回事，政界头面人物叛逃则是另一回事。

我反复考虑了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每一个问题和得出的每一个结论似乎都更使我感到处境的险恶。尽管如此，由于我憎恶这个我为之效劳的制度，也憎恶我自己助纣为虐，同时对新生活又充满希望，这就驱使我求助于美国人。我决定间接、非正式地探明他们的态度。但是如何着手呢？象生活里的许多事情一样，机遇从天而降。

在那个惊险的星期五之前的几周，我在联合国走廊上与一位早已相识的美国人邂逅。我们在工作和社交上都彼此相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为人机智，生性开朗。我也知道他在华盛顿有关系户。我当机立断，机会就在他身上。我告诉他我有件机密事想和他商谈，问他能否在次日午餐时间和我一起散步。

我们在联合国总部休息室的门口会面时，外面正下着倾盆大

雨。我们取消了原定的计划，但发现下一周我们将出席同一场外交晚宴。

在主人郊外宅第的角落里，我把我的朋友拉到一边。“我有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求你，”我突然说道。“我决定和苏联政府决裂。我想事先知道，如果我要求政治避难，美国方面将作何反应。”

他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地看着我。“什么？你别是开玩笑吧，阿尔卡季？”他问道。

“我是绝对严肃的。”他看来快吓晕了。

“我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我又说道。

我一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面问他能否在我采取行动之前为我了解一下初步反应，能否谨慎地探明华盛顿的态度，并给我回音。

他惊魂稍定之后考虑了片刻。

“这样吧，我们是老相识了，”他说道，“当然我会尽力帮你的。但我介入此事应该不为外人所知。我不愿任何人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我下星期去华盛顿。我会替你打听的，但是别再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甚至在饭馆里也不行。”

我们约好在联合国图书馆里安排一次偶然相遇，但不交谈，只传递纸条。

在他从华盛顿回来后的几天，我在约定的时间走进图书馆，看到我的朋友在参考书室的一角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书，那里除他以外没有别人。他看见我之后就把一张纸条悄悄夹入他拿在手里的书中，把书合好，放回到书架上。他走后我把书取下，抽出纸条。“有人正专程从华盛顿来会见你。我看你会受欢迎的，我希望和他的谈话会使你放心。”

纸条还写明要我次日2点半左右去离联合国大厦不远的一家书店。我的朋友和华盛顿的来人将在那儿等着我。我不和他们谈话，而只是要记住这个陌生人的容貌。次日下午3时半，我的朋

友将在图书馆中留下另一张便条，写明我和这个人会面的地点。我应在条上注明对我方便的时间，由我的朋友转告对方。“在那以后，你就好自为之。此条阅后销毁。”

次日下午我提早了一会儿到书店。那是一家小铺子，是个秘密接头的好地方。房子中间摆满了高大的象图书馆用的那种书架，店员们看不见两个书架之间的人。

我发现了我的朋友。他的同伴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神情开朗。我们在假装浏览各种书籍时，相互交换了眼色。我转身准备走出书店。一本约翰·卡尔的小说《迷途知返的间谍》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天下午所发生的正是许多电影和小说都描绘过的秘密接头，这一巧合使我颇有感触而买下了这本书。

次日3时半我又去联合国图书馆，发现我的朋友在另一本书中又留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我用心记住了。然后我写上：“本星期五晚上8至9时之间。”

星期五我通常都放我的司机去度周末，而由我自己开车。我的妻子莉娜在星期五饭后总是去格伦科弗。由于一般说来联合国在周末都很忙，她知道我要很晚才能回家。在外人看来，我开车去长岛是惯常之事。我打算在确定没有人跟踪我之后再折回城里。

我离开图书馆回到办公室后，开始仔细考虑我和华盛顿来人的会面。他是什么人？他会说些什么？他有权作决定吗？我能做些什么来使他相信我的动机是诚实的？他会要我做些什么来证明我自己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一再盘旋。我要的是政治避难，并要求给予保护使我不致被苏联要回去和免遭克格勃暗杀分子的毒手。但是我有点预感到对方的反应将是模棱两可的，含糊其词地答应把我的要求上报华盛顿的上司。

我开车沿着便道返回中央大道，这时心情已比较平静。穿过三区大桥后，我在东区北部的一条黑暗的街道上找到了个停车的

地方。我叫了辆出租汽车，乘到东区六十街和七十街之间的一个角落。我大约晚到了十分钟。我匆匆地沿着一条空荡的小街行走，然后来到一座普普通通的褐石砌成的房子跟前，走下了石阶。

门铃响后应声而来的人自我介绍说叫伯特·约翰逊。他身穿剪裁合身但式样过时的深色西服，握手很有力。

“我正在等你，”他说道。“上楼吧。”

约翰逊是一般性的应酬，但却是彬彬有礼。他问我喝点什么。我要了杯威士忌。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这是一个陈设舒适的藏书室，满墙都是书籍和绘画。但是这赏心悦目的环境并未使我的紧张心情有所缓解。

我仔细地观察他，从他的面部寻找线索来判明他是何许人。他的神态平易而自然，既无惊讶也无猜疑的表情。

他似乎在等我来开始我们会面所要商谈的正题。但是，尽管事先已多次私下预演过，我还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来这里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且，我也不是在这几天才决定要这样做的。”我终于开口了。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不知为什么，他这个姿态使我感到难受。

“出走的念头在我心中已酝酿多年了，现在我准备行动了，请你给予帮助，”我继续说道。

约翰逊又点了点头。可以看出，他是不会给我什么指点的，我只能依靠自己了。

“我要告诉你，我已决定和我国政府一刀两断。”我急不择词地说道。

他点头的反应显然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说些什么。可是我却更感局促不安。我突然明白，使我感到烦恼的是他没有象我预期的那样对我的动机连珠炮似地提出问题、进行批驳。我停顿了下来，这一停顿长得象有几个小时。约翰逊也无意

打破沉默。

我又接着开了口。我试图向他解释使我的信念变得明确起来的整个过程。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对此过去似乎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突出；这时，为了力求做到词能达意，我的头都发疼了。我试图强调我在心灵深处已不是个苏联人，也无法再成为苏维埃世界的一部分了。我告诉他在联合国里我得经常象个傻瓜一样，一方面捍卫苏联的立场，而同时作为副秘书长又责无旁贷得装出客观的样子行事。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我的理由似乎站不住脚，只得从另一方面再试试看。

我告诉约翰逊，开头我是充满希望的。我向他吹嘘，我是如何平步青云的，我有身居要职的朋友，我曾和他们一起上过学，也喜欢他们。我们之中有些人曾一度以为我们会有所作为，也许能有助于使苏维埃制度对外开放。

约翰逊只是坐在那里，让我漫无边际地往下说。我到后来才明白，他（还有美国政府）这时对于考察我的动机并无兴趣。他要做的是提出一项以行动而不是言词对我进行考验的建议。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多谈一些实际问题，而少谈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

“我不是为了追求金钱和舒适的生活，”我说道。“我享受苏联大使的一切待遇。我和我的妻子在莫斯科有一座漂亮的公寓，家中摆满了各种上等佳品。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有座别墅，是我们在乡间的住所，坐落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最好的地区。我们有很多钱——很多。我完全不是为了这些，”我重复道。

“为的是，作为交换条件，我得象机器人服从他的主人那样服从那个制度，而我已不再相信那个制度了。”

我告诉他我们的电话总有人窃听。克格勃不断注意着我，经常跟踪我。党总是要我做政治工作，这同我作为外交官所应做的工作毫不相干，但却干扰了我本人和其他人的私生活。此外，还要求我充当他们的宣传员，开会时鹦鹉学舌地说他们要我说的话，

并鼓励别人也这么想。但最令人厌恶的是，党强迫我监管在纽约的苏联同胞们的品德言行。这就要求我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而这正是我所憎恨的。我要为我所信仰和关心的事情工作。我要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来度此一生。

约翰逊默默地听着。然后他问我是否曾把这次会晤告诉我的妻子。我说还没有，但我打算告诉她。我看得出来约翰逊对我的答复是满意的，但他没再说什么。

最后，我提出了要求。我打算公开地弃暗投明，并为我自己申辩。我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受人控制。

“我要在没有任何政府指令我如何说话行事的情况下工作、写作和生活。贵国政府能让我这么做吗？”

约翰逊站了起来，走到房间一角的酒台前。他说，“我不知道你的酒量，但我要喝双份的威士忌。你怎么样？”

他讲话的口气使得一切大为改观，那是友善的口气。看来他理解我很紧张。突然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要求我进行自我辩护的机构或法庭。我当即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站在酒台前，他倒了威士忌和苏打水，并同我碰杯。那天晚上我们俩第一次相视而笑了。

他回到长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好吧，”他往后一仰说道。“首先，我授权向你提供你所要求的保护。如果你已准备弃暗投明，我们就准备欢迎你、帮助你，并且现在就接受你，如果你要我们这样做的话。”

“这正是我的要求，”我插话说。

“我们对你很了解，”他接着说。“我们长时期以来一直注意着你的工作，所以我要问你是否已经拿准了。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现在就应该告诉我。这件事一开了头，我们双方就都无法使它停下来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他说，在美国我不会享有任何作为苏联上等阶层的一员已经

习以为常的那些特权。没有汽车、没有司机、没有政府提供的宅第。苏联政府慷慨地施予其所娇宠的官僚们的奢侈品，这里概不奉送。

“所以那些你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东西，我们都不提供。”他又重复一遍。“你真能割爱吗？”

“能，我能。我知道生活中什么对我是重要的。”我突然感到忍俊不禁。我喜出望外，似乎感到我是在参加某种婚礼。这同我在两分钟以前的感觉真有天壤之别。

约翰逊呷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桌上。他瞧了我一会儿，然后说，“你知道，如果你在这里居住并公开露面，你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我深知克格勃会跟踪追击而不会善罢甘休。我不知道约翰逊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他要劝我不要叛逃，而不是帮我下定决心？我开始感到担心。

约翰逊打断了我的思路：“刚才你说你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你是否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走？”

“这个……”我踌躇了，“出走可以使我起很大作用。”

“那当然，”他说。“但是想一想，如果你在目前岗位上再呆一个时期，你能做多少事情。”

“你是什么意思？”

他描述了华盛顿当初听说我要出走时的兴奋情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对苏联人将是多大的打击。如果我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准备帮助我。但是也还有其他一些设想。我是否可以考虑继续担任一个时期的副秘书长？如果我们携手合作的话，我能从这一有利地位提供许多情报。我能帮助他们更多地了解苏联的计划和意图，以及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此外，他还指出，我也需要时间为日后我全家出走进行准备。

我感到好象被泼了一瓢凉水。

“这就是说你们要我当间谍，”我说。